

白话闲情偶寄

清·李渔原著



白话闲情偶寄

• 李渔原著

李瑞山 陶慕宁

罗德荣 编



[津]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：唐 舰
张克敏

白话闲情偶寄
清·李渔 原著
李瑞山 陶慕宁 罗德荣

*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天津市宁河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25 字数 266000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7—80504—321—3/I · 50

定 价：11.80 元

前　　言

历史的久远的沉默，往往是一种久远的期待，期待着公平、客观的评估与耐心的品味。

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他那部《生活的艺术》一书的自序中，列举了十几位他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杰出人物的名字。他赞扬这十几位人物“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，对事物具有太多的情感”。他声称自己的著作就是在这些杰出人物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完成的。林语堂还认真地预言，这些人物的名字“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占到重要地位的”。李渔就是林语堂所说的十几位杰出人物之一。

林语堂是在 1937 年作出这一预言的。时至今日，他的预言正在开始成为现实。

说李渔是清初的艺苑畸人、文坛巨匠，决非过誉。

李渔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。他虽然结交了不少名流，如吴伟业、尤侗、王士禛、周亮工等人，其中还有他的挚友；但是，在李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和周围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一直处在某种紧张的状态中。因为根据当时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，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人生选择就是做官；然而李渔那种以戏剧表演、小说创作和杂学采摭作为职业的生活方式，和他携妻拥妾、漫游江湖的放荡行为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他周围人的非议。有人责

难他“不为经国之大业，而为破道之小说”，有人则骂他“其行甚秽，真士林所不耻也”。更有甚者则斥其为“名教罪人”，说他“善逢迎”“性龌龊”……。而李渔对于这些泼来的污水，也没客气，恶狠狠地反唇相讥，揶揄这些口口声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的贪婪、自私、懦弱、落井下石和缺乏气节操守。从李渔与某些知识分子的磕磕碰碰，倒也看出了他的叛逆性格；进一步说，这些似乎不太愉快的事，还可以成为人们认识封建社会中人情世态的另一面的佐证。

其实，从什么观念、标准、角度来观照李渔才毕竟是问题的关键。从李渔一生行状来看，他的思想、感情、品行都是和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和价值尺度相悖的。如果说，明代李贽提出了“勿高视一切圣人为”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所在，那么李渔正是一位敢于把这一要求付之行动的人物。他的叛逆性格由来已久。他不但率领由自己的妻妾所组成的家庭剧团到处演出卖笑，展示色相，而且公然在寓所前挂上了“贱者居”的匾额，向那些鄙夷他的、自视清高的道德家们进行挑战。无疑，李渔是一位带有强烈启蒙思想的艺术家。他的哲学意识的基本点，实际上就是对神学化了的儒学，亦即宋明理学的反拨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李渔继承和发展的恰恰是明末狂飙突起时代，以李贽、汤显祖为代表的反传统的浪漫主义精神。

进一步看，李渔招致众人诟议的另一重要原因，是李渔过分坦率地把他的写作动机与对金钱的考虑挂上了钩。对于生活在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来说，他们是拒绝承认和耻于谈论为金钱而写作的。在他们看来，把崇高的舞文弄墨与金钱联系在一起，是令人不可思议的，甚至是玷辱斯文之事。而李渔恰恰直言不讳。他认为，他的写作是他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命脉。比如李渔组织的那个家庭戏班，就有很浓厚的商业性质。他的雇主，多属上层人士，但他又非只受知于一人。他往往带领戏班在某地为某官演唱一段时间，便移居他处，为新雇主效劳。显然他是在考虑生意和收入问题，而并非唯主人之命是从。因此，他的行动又有一定的自主性。至于

他的经济收入，还有的来自他的创作，即他的小说、戏剧和诗文集以及各式杂著的出版。据他自己说，为了避免各种中间商的盘剥和书商的盗版事件出现，李渔多是自己印刷和自办发行。这在当时的知识界简直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。而像李渔如此滴水不漏、精明计算的人，在当时的文化界也实属罕见。然而，今天来看李渔，他倒真是一位具有超前经商意识的文化人。

不必讳言，李渔确实经常出外“打抽丰”，做达官富豪的“帮闲”。他对这些人曾经溜须拍马，卖笑追欢。他甚至还为富人们设计过及时行乐的方法：他研究亭台楼阁、池沼门窗的布局，安排花草虫鱼、鼎铛玉石的摆设；他更联诗凑对，清谈打趣，几乎无所不为。但是，他也不时感到落寞和荒凉。这就应了一位西方哲人的一句名言：他的生活环境是他鄙视的，但他又始终被困在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生活环境里。总之，他既孤高，又庸俗；他心有渔樵之思，又不能不厕身于金粉之中。他“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”，有时则是个十足的小市民。

李渔学识渊博，才气横溢。虽然他生前穷愁半世，自叹“饥来驱人”，“伤哉，贫也”，但是，他却把数以百万计的文字留给人间，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颗颗明珠。

与明清之际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巨匠们相比，李渔以艺术兴趣广博而著称。李贽、徐渭、汤显祖、黄宗羲、顾炎武诸大家，大多是在各自专门化领域中成为至高无上的领袖人物或巨人的，一旦他们迈出了他所在之领域，就往往捉襟见肘。而李渔则较少受到领域分割或专业区分的限制。他可以信马由缰，而且每到一个文化疆域，即可以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世界，并能达到令人刮目相觑的艺术水准。比如，他既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良的心，又不时调侃众生，且游刃有余。于是在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中，他总靠着他那机巧和智慧，永远地把不幸者从困境中解救出来；他不断地编织又不断地拆穿各种骗局。他能有滋有味地解说着杂耍、戏剧表演、治理家庭乃

至要饭的诀窍。即使洗澡这样一件生活小事，他也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套道道来。他在《闲情偶寄·沐浴》一节中，讲的就是洗澡之法。他认为，如果把很热的水直接浇到身上，“以热投冷，以湿犯燥，几类水攻”。李渔想出了应付的方法：先把水温调到温和的程度，由腹及胸，再由胸及背，洗的过程中把水温逐渐提高。这样洗来，肯定大有益于健康。反之，洗澡无法，或许能把人伤了。这说明，李渔颇谙健康生理学。

李渔甚至还热心地编过一本名为《资治新书》的有关司法案例的小册子，以帮助减少司法审判上的不公正的弊端。在该书的一节中，李渔分析了身为长官者将碰到的各种冤情，并指出真正关心百姓疾苦的人，在断狱方面不能不小心从事。另外，他指导和编撰出版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至今还是中国画技法方面的一本权威性的入门指南。

是否出自李渔手笔尚未有定论的两部长篇白话小说《合锦回文传》和《肉蒲团》也值得我们重视。特别是《肉蒲团》一书，笔者认为当为李渔之作。因为无论其思想蕴含还是文字风格都绝似李渔之机杼独运。小说中对性心理和性审美，皆有不同凡响的体验，且自具手眼。在明清艳情小说中仍属佼佼者。

至于李渔评点、改定的两部长篇小说：《三国演义》和《金瓶梅》，则为古典小说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。

在李渔的众多著述中，《闲情偶寄》是他最为得意的一种。此书写成于康熙十年李渔六十多岁之时。这时他的两部小说集：《无声戏》、《十二楼》和十种曲、《一家言》初集等主要著作都已完成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《闲情偶寄》是他一生艺术经验的总结和结晶。该书原分八部十六卷，论及戏曲创作和导演、服饰妆扮、园林建筑、器具古玩、饮食烹调、种树养花、医疗养生等诸多生活美学方面的问题，新意迭出，堪称一部精彩的生活艺术大全。

比如，“居室”部就侧重于对园林审美特点的研究。他主张构园

造亭须自出手眼，并对品石叠山、借景框景等造园艺术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。“词曲”、“演习”二部和“声容”部的有关章节，对我国戏曲表演导演理论做了全面的总结，可谓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的一块丰碑。虽然古今戏曲体制不同，有些内容又过于专门，但因为作者特别重视“人情物理”，人又极为聪明，故在其笔下，不论何事，都讲得入情入理，极富趣味，也蕴涵着许多人生感慨，使人读之，并不感觉枯燥、隔膜，反而会情味盎然，多有会心之处。

《闲情偶寄》问世以来，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重视。

例如知堂老人对《闲情偶寄》就评价甚高，多次予以称赞。他认为李渔“对于文学的见解和人生的见解都很好”。说“他有他特别的知识思想，大抵都在《闲情偶寄》中，非一般文人所能及”。说“他是了解生活法的人”。他还驳斥李渔同时代有些文人对李渔其人其书的指斥，说：“读书人动不动就把人家当少正卯，拍案大喝，煞是可笑，却不知其纤悉讲人生日用处，正是那书的独得处。”“纤悉讲人生日用”，也正是此书使现代人仍然感到浓厚兴趣的原因所在。如书中讲饮食，从容道来，娓娓动听。知堂说，如果拿十分看不起李渔的袁枚的饮食名著《随园食单》，“来与‘饮馔’部的一部分对看，笠翁犹似野老的掘笋挑菜，而袁君乃仿佛围裙油腻的厨师矣。”可见其高妙和引人入胜。

又如书中的“种植”部，知堂指出：其“文字思想均极清新，如《竹》、《柳》诸篇都是很可喜的小品，其余的读下去也总必有一二妙语散见篇中，可以解颐。这是关于花的小论文，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，有平明而新颖的表现，少年读之可以医治作文之笨”。再如关于“颐养”部中李渔提出的“常见可欲亦能使心不乱”的观点，知堂表示激赏，说“这实在可以说是性教育的精义”。在今天，这个观点对于反禁欲主义的性学启蒙，也不无意义。由此可见《闲情偶寄》一书的价值。

细细统计起来，李渔的著述目录是一张包括从戏剧理论、诗文

创作、小说戏曲到读史札记、建筑营造、美容保健的五花八门、内容浩瀚又庞杂的清单。李渔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，他的全部著述也堪称百科全书式的读物。而且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从他的代表作中，使我们看到，古老的中国文化艺术，在他的智慧的笔下绽露出走向现代的最早曙光。

人生，就两个字，距离很短。从生到死，中间的那一片开阔地，往往丛生着令人困惑的荆棘。其实，我们无须惊诧于李渔的生前困顿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李渔活得还是满轻松、满潇洒的，而且有声有色。他在当时实际上是比别人更早越过了那片片困惑之地，到人世间走了那么一遭，累了，如鸟鹊倦而知返。归去也，何其快哉！

李渔，原名仙侣，字谪凡，号天徒，改字笠翁，别署觉世稗官、随庵主义、觉道人、笠道、伊园主人、湖上笠翁、新亭客樵等等。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(1611)，清圣祖康熙大帝十九年(1680)正月十三日善终。

顺便指出，本书译者考虑到词曲部“音律”一节和演习部“授曲”一节“曲严分合”段专业性很强，于一般读者未必有多少益处，所以未予译述。

宁宗一

1993年5月8日

序

《周礼》这本书，本来是讲王道的，但上自井田、军国的大政，下到酒浆、草鞋这类小事，无不讲得细致完备，处理得恰到好处，所以说“王道来源于人情”。然而王莽把它第一次用在汉朝失败了，王安石把它第二次用在宋朝又失败了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完全是因为王莽与王安石，都是不近人情的人物，采用《周礼》固然会失败，不用《周礼》也要失败。《周礼》不幸被这两个人使用，那是他们使用《周礼》的过错，不是《周礼》本身的过错。北宋人苏明允说：“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，很少有人不是大奸大恶。”古往今来的大功业、真文章，总不出人情以外；那些在人情以外的，不是些鬼神荒诞虚妄的事情，就是些欺诳虚幻狡猾的言辞，能够切合饮食男女家常日用的内容，大概就很少了。

我读了李君笠翁的《闲情偶寄》，深有感慨。过去陶渊明（字元亮）作《闲情赋》一文，其中写到他希望成为美人所用的东西：为衣领，为衣带，为鞋袜，为床席，为粉黛，为汗泽，为影，为烛，为扇，为桐，缠绵深挚，聊且寄托他的闲情；而其心中的万千思虑，游于极远之后的休憩之念，也就由此可以类推了。现在李君《闲情偶寄》一书，讲的都是人们耳闻目见的事情，表达的却是超出风云之外的思想。前人想要发表而终究未能发表的见解，李君全都发表了出来；

今人所想要说而不能说的话，李君全都说了出来；言辞浅近，旨意深远，情感饱满，材料丰赡，内容广博，条理谨严。昏昧的人读了它，会变得心胸旷达；拘迂的人读了它，会变得潇洒通脱；悲伤的人读了它，感到愉悦；笨拙的人读了它，变得灵巧；愁苦的人读了它，欢喜起舞；患病的人读了它，霍然痊愈。这不是李君偶尔寄托闲情的书，而是天下雅人高士家传户诵的书。我知道这书一出，就会不胫而走，使得外国使臣停下船来索求，海外商人运来金子抢购。而世上迂腐的儒生，还说李君不作正经文章，即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大业，反而写这些离经叛道的小玩艺儿。我回答这些人说：你们说的这些也对，也不对。当年东晋人谢文靖高卧东山之中，天下百姓的愿望系于一身，而他出外游玩时一定要携带乐妓，住在家里时就与人比试围棋。谢玄攻打贼军，桓冲起初有些担心，郗超说：“谢玄一定能破贼。我曾和他在桓公府共事，连穿鞋子这类小事情他都善于利用，所以我知道这一点。”唐朝人白香山（白居易）仙风道骨，气度不凡，为世人所钦佩，而有谢好、陈结、紫绡、菱角等歌妓，屡次演唱《霓裳羽衣曲》；被罢免刑部侍郎官职时，还带了几百名从事奏曲演唱的仆从还乡。宋朝人苏文忠公（苏轼）性情刚正，不标新立异，不轻易追随世风，而有琴操、朝云、螭头、鹊尾等歌妓，每次听到她们清唱，都陶醉感叹。唐朝人韩昌黎（韩愈）廓清迷雾，驱除鳄鱼，在朝廷上树立起师表形象，而每当宾客聚会，常常唤出两名侍女合弹琵琶筝曲。所以说，古往今来能建立大功业，写作真文章的人，一定有超世绝俗的情态，磊落潇洒的韵致，如上面所举谢文靖等各位就都是这样。现在李君以雅致淡远的才华，灵巧精妙的文思，惨淡经营，精心构造，就是所谓治理国家的大功业，又何尝不在其中呢？难道还说什么离经叛道的小玩艺儿吗！

回顾以往，我年少气盛，驰骋四方，自命为江东风流之士，遴选歌妓，作曲填词，吹箫弄管，舞步轻盈，曾经靠一曲狂歌，赚得红粉佳人两行清泪。而今我老了，不会再有这些了！只是还思念高远，

序

千百年中事仍萦回在胸，深深嫌恶王莽、王安石的不近人情，而独独喜爱陶元亮的为闲情作赋。读了李君此书，又不免旧习难忘，见我所好即跃跃欲试。晋人王右军（王羲之）说：“到了垂暮之年，正需要丝竹之事陶冶性情。”我虽然已经衰老颓唐，但倘若遇上洞房花窗，鼓瑟齐鸣，乐歌竟陈，还是会袖手支颐、倾耳细听的。

康熙十年（公元 1671）辛亥岁立秋日
建邺（南京）弟余怀无怀氏撰

凡例七则(四期三戒)

一期点缀太平

圣明的君主在位当政，努力推崇文章教化；朝廷已经陈设了诗赋，民间自然应当奏响民歌风谣，这就是所谓上行下效。武士们的矛戈，文人们的笔墨，是治世乱世各自需要的东西；世道纷乱就用它削平谋反与叛乱，世道安定就用它来为太平盛世作些点缀。现今天下清明，太平征象明显，正是文人舞笔弄墨进行点缀的时机。所以我在闲暇的日子拿出笔来，挥毫作文歌颂德政。书中所讲的八种事情，没有一种不新颖，我所写的二十万言，没有一句陈辞滥调。这是因为革故鼎新的盛世之中，应当有一两件人们前所未见的事情、前所未闻的言辞，来开阔视听，新人耳目。就如同一幢壮观的大厦竣工落成，决非残朱剩碧所能涂饰房椽屋柱一样。我作为一介生于草莽、官职卑微的臣子，怎敢推辞这文饰粉藻之劳！

一期崇尚俭朴

创立一种新的规制，最要避忌的是引导人奢费。奢费的事穷人难以施行，却会使富贵之家一天比一天流于奢侈。那就是败坏风俗的书，不是扶助名教的书了。此书中只有《演习》、《声容》两种属于显贵者陶冶性情的事，想要节俭不好做到，不过也节省了靡费支出

的一半。其余部分如《居室》、《器玩》、《饮馔》、《种植》、《颐养》各部，都在各种规制的介绍中包含了节约俭朴的原则，在各种规矩的确定中暗含了去除奢靡的主旨。富有天下万物的人可以实行，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也可以做到。这是因为我身处极为贫穷的境地，知道物力最是艰难，误认为天下人的贫穷都和我一样，我不想那样去做的事情，就不硬推荐给别人，所以不觉得自己说的似乎有些悭吝。不过侈靡浮荡的世风，也许反而因此受益。

一期规正风俗

如今风俗的奢靡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，是由于人们的喜新和尚异。新、奇都不违法，但要新得有道理，异得有法度。有道理、有法度，总的要求是期望不失人情物理的正道。凭那种搜奇行怪的风俗，想要督责它全都返回至中庸之道，是根本不可能的；不如用有道理的新代替那种没有原则的新，以有法度的异代替那种没有规矩的异。那样也许可以使人们愿意实行，而我点缀太平盛世的愿望也不落空。此书所记载的内容，都是极新、极异的见解，不过没一种不是有正道作规范，我可以认为自己对世人没有罪过，也正是因为这个。

一期警惕人心

风俗的奢靡，是由于人心的败坏。要纠正风俗，一定要先纠正人心。然而近来人的性情是喜欢读闲书，害怕听庄重严肃的言论。有心劝世的人一本正经地正告他们，却没有效果，拐弯抹角地引证、譬喻，就事半功倍。我这部书，纯粹是出于劝善惩恶的用心，但却不标明劝善惩恶的题目；书名所以叫做《闲情偶寄》的原因，就是担心人们把它看成一本正经的正论而避开它。劝善惩恶的言论，以

下半部分居多，前几篇都谈的是风雅韵事。正论所以不载于起始部分而附在后面，是希望人们由风雅之事渐渐深入到庄严之论，而不觉得有什么可怕。劝惩的旨意，决不明白白白地讲出来，或是借草木昆虫这类微末小事、或是借活命养生这样的大题目而寓于其中。这就是上面说的：一本正经地正告，事倍功半，旁敲侧击地比喻、引证，就游刃有余。我写这书实在是苦口婆心，用心良苦，决不同于那些客套话。正人君子，奇人异士，希望都能体谅我的苦心。

一戒剽窃陈言

鄙人写了半辈子文章，从不攫取别人一字一句。因为学问空疏感到自愧的情形是有的，因为讲得有些荒诞虚妄被人讥讽的情形是有的，至于抄袭陈言，落人窠臼，拾人唾余，却说成是舌下莲花新发，这种事情就不仅自己确信没有，连海内外著名人士也都知道我是不屑于去做的。不过我从前刊刻的一些杂著，新确实是新，但还属于一年一生的草，不是百年砍伐一次的树木。草青翠时可爱，枯干时就会被烧掉；树木即便不能做栋梁之材，要是砍了它当柴禾烧掉，人却不忍心。所以说这部书，最初刊行时就象刚长出的草，即便以后它已经年久陈腐，也还可以比作不忍砍伐作柴烧的树木，因为它可以雕琢，适于实用。用它来作藏书家致力收藏的名著或许有所不足，把它比作人们随身携带的口袋读物就绰绰有余了。阅读此书的读者，请从头至尾检验它是新颖还是陈旧。如果找到一句话是别的书现在有的，只有有人说出来，那作者我不是别的，就是武库的挖洞小偷、文场上的窃辞大盗了。

一戒网罗旧集

几十年来，著作名家们都有著书捷径，靠着一点点片言只字，

就能造出连篇累牍的繁冗文章，如果有了连篇累牍的繁冗文章，就能变出汗牛充栋的等身著作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造出一两句新词新句来缀在开头，随着就收集古今有名论述加在后面。如果是讲天文，就纂集有关天文的各种往事及前人所作各篇词赋作品来填充，讲地理也如此，讲人物、鸟兽、草木等类事情也都一样。创作又兼引述，有事半功倍的效能，可真是个好办法。鄙人之见却认为：著作就是著作，引述就是引述，不应该首鼠两端，自乱体例；宁愿捉襟见肘显得贫乏，也不东拉西扯，用别人的东西显示自己多么富有；有就说有，没有就安心说没有，不用一句旧著里的话，来填补新作中偶然的缺失，不借前人的一个字，来证明后来的事情如何不合常理。读者在此书的几项内容里面，请不要事事、句句求全责备。这是新人耳目的书，不是预备人考证核查的书。

一戒支离补凑

有人责怪此书在立法度方面不够完备，认为既然有心开创新例，就应当使每种东西都有固定的规范，为什么在一类当中只谈几种呢？我回答说：“医术贵在专门而忌杂，一杂，就有灵验有不灵验了。史书贵在能有缺文，《春秋》一书文字残缺的地方，一个字也不增添，不去改正讹误，就是为表示它能有缺漏；有缺漏才可信，如果很完备，就会引起后世天下人的疑惑。假使像你说的那样追求每件事都完备，一样东西也不遗漏，就会显出支离分散勉强添补凑数的弊病，人们将不但对可疑的地方产生怀疑，连可信的地方也会产生怀疑。所以说好的方法不能在世上推行，都是求全责备这一个想法的失误。我以一个人的力量而不自量力地陈说八件事情，由词曲、演习直到种植、颐养，虽然说能做许多鄙俚的事情是低贱者的常态，不过还是自己担心太杂，终究比不了专门的医师，怎么还要把所有星术、相术、医术、占卜、风水堪舆、择日这些事情，都拿来要

求一个人懂得呢？”那个人听了我这番话，连声说着“不然、不然”走了。此书的八部之中，事事都创立了法度的只有六种，至于《饮馔》、《种植》两部所讲的，不都是法度，常常夹杂着评论。我宁可以支离分散的形式立论，不敢这样来立法，是恐怕误导天下人。不过自认为立论的优长，还是胜过立法的。请让我拿此书请教海内有名望的诸公：它果然能够避免支离破碎的谴责吗？

湖上笠翁李渔记